

§ 符号学研究 §

# 建立解释主体：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建构

唐小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建立主体符号学是符号学学科奠基的重要环节。主体符号学的建构有两个维度：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进入反讽时代，意义在文本中发生位移越出边界，发送主体和文本主体均不可靠，建立解释主体不仅成为符号学的内在要求，且引导着符号学研究范式从单纯的方法论，转向可使用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解释主体；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12) 02-0049-08

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如果从索绪尔、皮尔斯算起近百年。符号学学科的建立，才半个世纪。但随着高度符号化社会的到来，符号学已成显学。不过热闹之下，潜伏危机。危机之一，是主体符号学在整体上的缺席。换言之，关于主体符号学的建立，还得从头开始。在笔者看来，只有建立了主体符号学，符号学学科的奠基性事业才算完成。麻烦的是，主体狂热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主体破碎的反讽文化局面。这种局面下，如何建立主体符号学？建立何种主体符号学？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拟深入这个时代知识的内在逻辑和主体符号学建构的某些尝试，作一粗略探讨。

## 一、反讽时代及其符号主体

谈论主体符号学，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关于“主体”的辨析。主体一词，意义含混，中西理解殊异。西方更强调心灵主体，华夏一脉则偏重认知与实践合一主体。在中国，主体是“主宰”的、主动的；在西方，主体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是被动的，还可以是“屈从”的。<sup>①</sup>在人类思想史上，主体之义太过丰富与复杂。从亚里士多德将主体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sup>②</sup>经

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到拉康、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主体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进入当代，当批判和文化理论逐渐从“自我”这个词偏离出来，用“主体”取而代之的时候，主体早已不是所有知识的起源和形成知识的“本源的、先验的条件”的那个主体，也不仅是拉康、阿尔都塞们被“语言”、被“意识形态”等建构的那个主体，它似乎漫漶成一条没有边际、漫无目的且不断流逝的大河，任何关于其独立、自足、统一的想法，都可能被置于可耻的谎言之下。显然，要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辨析清楚，委实不易。不过，在我看来，可以给出一个最简最宽的定义：主体即人。个体、自我、身份、人格等等，均可视为主体同一家族的词汇，在特定语境中可以相互替用。

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sup>③</sup>主体符号学即是关于人与符号关系的学问。我认为，它大致有两个论述方向：一是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考察人是如何作用于符号意指的，是怎样将意义植入符号，使符号成其所是的。二是符号学关照下的人是怎样的。亦即运用符号学原

①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②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67页。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作者简介：唐小林（1965—），男，重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一般叙述的符号学研究”（11XWW001）

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在前一个论域里,人是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可称之为“符号的主体学”;而后一个论域,则是关于人这个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可名之为“主体的符号学”。因此,主体符号学,既是关于“符号的主体学”,又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完整的主体符号学,应当在这两个维度上建立。如果按照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即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sup>①</sup>那么,第一个论述方向,讨论人在符号内部结构中的位置及运动方式,更偏重“符义学”;第二个论述方向,则更多落入“符用学”的范围,重心在解析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人。当然,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仅有第一个论域,即“符号的主体学”才有资格成为“主体符号学”,这与“主体性哲学”类似,它始终把人作为符号学的出发点和中心。而“符号的主体学”,不过是符号学理论在“主体”研究上的应用,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由于符号学界将后者视为主体的符号学已成惯例,比如对巴黎学派“激情符号学”的定位。本文遵从惯例,将此作为主体符号学的另一维度。

建构主体符号学,是一项“先驱者的事业”。对此,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等有所警告:必须尽量避免“先驱者的病毒”,“即那种不了解一个时代知识之内在逻辑关系的先入为主的偏见”。<sup>②</sup>对于建构主体符号学而言,就是要事先了解其身处的时代位置及其符号特征,此处之所谓“时代”,与“知识之内在逻辑”相关,非政治的、经济的时代,而是文化意涵上的。这个时代关涉到人类意义的建构方式。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意义建构的历史。意义历史如何演进,有不同的猜想。这些猜想,不乏落入符号修辞理论的。或者说,符号修辞理论对这些猜想完全解释得通。符号修辞的四个主型

之间层层否定的递进关系,即意义的“四体演进”逻辑:隐喻(异之同)→提喻(分之合)→转喻(同之异)→反讽(合之分)<sup>③</sup>,有意无意地成为某些思想家用来把握历史演进的方法。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恐怕是最早涉及人类历史的“四体演进”的。他在写于公元1世纪的《变形记》中,寓言人类历史为黄金、白银、黄铜和黑铁“四大时代”。<sup>④</sup>18世纪的维柯,也许受到奥维德“历史退化”观的启发,他将人类历史描述为从神祇时期向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的依次递降过程。这一过程体现的,是从以比喻为主,向以转喻、提喻、反讽为主“四体演进”的历史符号修辞。<sup>⑤</sup>从叙述学角度,将“四体演进”推演到极端的,是20世纪中叶加拿大批评家弗莱,他认为罗曼史、悲剧、喜剧、反讽构成人类艺术叙述的四大循环,并断言今天已进入反讽时代。<sup>⑥</sup>

认为反讽已构成今天这个时代特征的,有来自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和学者,诸如皮亚杰、汤普森、海登·怀特、德曼、罗蒂等。即使用另外的词,比如“后现代”来描述当今的文化形态,其底里依然是反讽。林达·赫琴就明确宣称:“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反讽处于支配地位。”<sup>⑦</sup>于是,在符号学家看来,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进入反讽社会,“反讽在当代已经扩展为人性与社会的根本存在方式,成为文化符号学的本质特征”。<sup>⑧</sup>

但在何为反讽上,看法并不一致。“首倡、引进反讽的是苏格拉底”,<sup>⑨</sup>可苏格拉底对此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这就给人类思想史以极大的“反讽”想象空间。从被称为“混乱之母”的浪漫反讽到后现代的反讽解释,反讽被不断赋义到近乎反讽的程度。黑格尔视苏格拉底的反讽为“人对人的特殊交往方式”,是“主观形式的辩

① 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114页。

② 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

④ 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⑤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18页。

⑥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5-299页。

⑦ Linda Hutcheon,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67.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17页。

⑧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09页。

⑨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证法”<sup>①</sup>是以自己的故作无知去引导对方认识自己的无知,是绝对理念的显现手段。克尔凯郭尔则将反讽置于整个人类的存在来考察,认为“反讽本身便是存在的本质,须于无处不在的反讽之下认识事物”。肯尼思·伯克从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以及修辞批评的角度入思,对反讽的诠释,不仅是语言符号学的,而且触及到这个时代符号反讽的实质。伯克试图“通过提示隐喻、换喻、反讽、提喻这四个比喻,尤以反讽为中心,去消解二元论”,在伯克看来,反讽相当于有着多元视角之视角的总形式;反讽展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可能,它所强调的不是线性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时间性”,而是作为“没有终结的会话”的历史过程的“空间性”;语言存在于多元多层的关系中,其本身就是一种反讽性的存在,“对立双方中有一项起着语境作用,它赋予另一方意义”。推演开去,所谓事物的定义,总是以“否定性地言及”事物为前提,并作为语境存在于前提中。正是这种悖论赋予事物以关系性,成为意义的重要因素。所谓语言,乃否定性前提本身的产物,如果词语是显在层面的话,那么对立方的词则是超越性层面、潜在层面。同样,保罗·德曼也从语言的修辞性角度去思考反讽。德曼推崇施莱格尔,认为人们对理解力与语言关系的过于乐观是可疑的。在德曼那里,反讽是“无限的绝对性否定”力量,是“对实体自我化、意义、起源或者作为终极的阐释性真理等的拒绝”,是文本自我审察之令人眩目的过程。

伯克和德曼都将语言的修辞性,作为入思反讽的前提,启发我们对反讽时代意规律和符号特征的探究。那么,反讽时代,符号及其表意究竟有什么特征呢?笔者用“否定”、“距离”和“断裂”这三个关键词来描述。伯克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对立项之间是以“否定”性的关系存在。如前所述,所谓语言,不过是否定性前提本身的产物,语言的两个对立项互为语境,意义则为语境所决定。这样词语总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它必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显在层面,一个是潜在层面。如果此词语是显在层面的“yes”的话,那么处于潜在层面或超越性层面的

就是“no”。这两个层面既相互否定,又相互赋义。其对立项共同拥有的中间部分,即是被排斥的第三项,对双方起着限制作用,并构成运动不已的中间地带。伯克反讽原理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语言符号自身存在的悖论性或反讽性特性,而且将这一特性分解为对立项和中项,呈现出语言符号的构成性特点,并对符号“标出性”的研究具有某种启示性。

德曼从浪漫派反讽那里得到灵感。他在语言与理解的不可能关系上发现了符号、符号行为之间的“距离”,德曼质疑,“批评家们误认为可以复制或‘感性重现’作家灵感闪现的瞬间状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存在于文本与评论之间’以及‘时间形式的批评家理解行为内’的某种‘存在论距离和间隙’”。从此点检查,反讽是一种艺术手法,一种美学,其符号特征即在于,言说者“即使与被言说之物发生关联,它也保持距离,一个嬉戏的距离,以美学技艺为手段去言说。”难怪,人们常常把反讽时代称作“审美化”或“泛艺术化”时代。德曼将这种“距离”或“分离”性归于语言中无所不在的修辞性结构。而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的这种“修辞性”在反讽时代正被不断夸大和强调。

本雅明“历史等于翻译”的反讽解释被德曼引用和发挥,并由此引出符号及符号文本内部的“断裂”性。在德曼看来,“施莱格尔反讽色彩的批评,作为新的规范性决定力量,与破坏原有文本稳定性的翻译行为相类:摧毁原有秩序,摆脱既有的规范,使文本流动起来”,导致“原作与翻译之间的断裂性,语言与意义之间的断裂性,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断裂性”<sup>②</sup>

关于反讽时代符号及其表意特征的论述,显然比我上面的叙述还要复杂。“否定”、“距离”、“断裂”也不全都在符号和符号文本的某个相同层面来谈论。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通性。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比较直截了当,反讽的一贯之规是:“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在我说话之时,思想、意思是本质,而词语是现象。”<sup>③</sup>今天的符号学家对此表述得更加简明: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9页。

② 以上关于克尔凯郭尔、伯克、德曼等的反讽理论表述,参见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93-100页。

③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第212页。

反讽就是符号的“呈现义/表现义”，或者“表面义/实际义”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互相否定。<sup>①</sup>这意味着，作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的符号，“感知”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不是“合”的关系，而是“分”的关系，不是“同”的关系，而是“异”的关系。单从“感知”或“能指”无法直接洞察“意义”或“所指”。换种说法也对：感知/意义、能指/所指之间不仅不透明，有时简直模糊得像黑洞。这个特点，既是语言符号的，也是非语言符号的，覆盖反讽时代的人类表意系统——文化全域。

符号的此一特点，决定了文本的表意方式。文本是一个被组织的符号链，这个符号链在接收者看来具有时间向度和意义向度。反讽时代的文本，因符号表面义与实际义的悖谬，“真实”意义，或者说意义的“真相”移出文本之外。不是说文本没有意义，而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发送者要表达的意义。也不是说发送者没有诚信，恰恰相反，而是说文本不可信：文本不直接呈现实际意义，或者“不再指向意义，只留下意义的痕迹，或者说似乎有意义的逗弄”。<sup>②</sup>反讽时代符号文本的这个特点，早在浪漫反讽派那里就被察觉，施勒格尔根据其评论《断想集》的结论认为，“所谓的文本语言是逸脱于意图的”，文本自律性，使发送者的意图被“误读”或“误解”成为常态，没有终结。<sup>③</sup>

意义移出符号、移出文本。意义发送者的真实意图，被隐藏在符号和文本之外。或者其意义发送的目的本身就是反意义的，比如某些先锋艺术。“误读”或“误解”成为常态。面对符号及其表意的如此特征，真正的符号主体在哪里？或者主体符号学如何可能？

困难是明摆着的。克尔凯郭尔《反讽概念》开篇就指出：“作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反讽是主体最飘浮不定、最虚弱无力的显示。”那么，“最飘浮不定”的主体，如何把捉得住？更进一步，他认为反讽只有现实因素存在，不复有主体

性，因为主体性已经被赋予世界之中。<sup>④</sup>德曼通过凸显动机、语言形式、内容之间的隔阂，实际上消解了传统的认识论主体。显然，在反讽时代，真正的符号主体已经不可能是传统的认识论的。建立主体符号学，必须另辟蹊径。

从符号化过程来看，主体行为可以发生在三个环节上：发送、文本、接收。诚如前述，在反讽时代，发送主体和文本主体已隐而不彰，或者躲藏在符号、文本的烟幕之后。发送主体和文本主体的隐退，唯一让一个可以把握的主体留下并在此，那就是接收主体，亦即文本的接收者。这个接受主体，实质上是一个解释主体：符号和文本的意义靠接受者来解释、来赋予。面对符号和文本，解释即意义。或者说，解释建构意义。显然，让解释主体来担当符号主体，是反讽时代符号表意的特征所决定。因此，建立解释主体，就成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内在要求。

## 二、解释如何成为符号主体

符号学与“解释”的关系与生俱来，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成为符号主体是最近的事。符号学哲学学派的创始人皮尔斯，在对符号进行逻辑三分时，就将“解释”与“符号”、“对象”并列，组成符号的三元组合模式，并充分注意到解释项在符号化过程中的作用：“我所说的符号化过程 (semiosis)，意思是指一种行为，一种影响，它相当于或包含三项主体的合作，诸如符号、客体和解释因素”。<sup>⑤</sup>他还据此提出“无限衍义”与“试推法”等关键理论，奠定了当代符号学的基础。后继者莫里斯发展了皮尔斯的解释理论，不仅认同符号过程具有三种成分：“指号媒介物 (sign vehicle)、所指谓 (designatum) 和解释 (intepretant)”，而且认为“解释者 (interpreter) 也可以包括进来作为第四种因素”。<sup>⑥</sup>艾柯在深入阐发皮尔斯、莫里斯符号解释理论的基础上，又从“各种各样的解释成分”、“无限符号化过程”和“代码理论中的解释成分”等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 211-215 页。

② 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 页。

③ 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 222-223 页。

④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第 1、226 页。

⑤ 参引自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7-18 页。

⑥ 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 80 页。这里的“指号”是“符号”的另一种译法。

方面, 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和深化。<sup>①</sup>

不过, 虽然皮尔斯、莫里斯和艾柯一个比一个更加重视“解释”在符号表意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还没有谁将它提升到符号主体的位置。或者说, 由于历史语境和时代知识内在逻辑的制约, 使他们都还未将解释作为符号主体。在上面的引文中, 皮尔斯在谈到“解释”的时候提到了“主体”, 他认为符号化过程是符号、客体和解释因素这“三项主体的合作”。可诚如艾柯所指出, 此处的“‘主体’并非人类主体, 而是三种抽象的符号学实体”。<sup>②</sup> 诺伯特·威利也作如是观: “不管符号、客体还是解释项, 对皮尔斯而言, 都不是作为主体的人。”<sup>③</sup> 其实, 在皮尔斯那里, 解释只是符号引起的观念。我们从皮尔斯关于符号的定义可以看出: “符号代表相对于其产生或调节之观念的东西……它所代表的东西被称做对象: 它所传达的即其意义; 它所引起的观念, 即其解释成分。”艾柯的理解是正确的, 皮尔斯之所谓解释, 只是保证符号有效性的因素, “是指涉同一‘客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是诠释第一符号的另一种符号”, 而另一符号还将被另一符号所解释, 如此类推, 以至无穷, 走向“无限符号化过程”。<sup>④</sup> 另一方面, 解释的作用在皮尔斯符号理论体系中是有限的。皮尔斯把符号分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三类, 在他看来, 解释只在规约符号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认为, 规约符号“如果没有解释者”, 就“会失去那种使它成为符号的特性”, 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则不会。<sup>⑤</sup> 莫里斯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 将“解释”定义为“作为一个指号所引起的反应倾向”,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只蜜蜂找到了花蜜, 在回到蜂窝去时, 以“跳舞”的方式指引其他蜜蜂飞向蜜源, 这之中, 跳舞是符号, 感受到跳舞的其他蜜蜂是解释者, 而这些蜜蜂因为跳舞而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

的倾向就是解释。<sup>⑥</sup>

当然, 无论是皮尔斯、莫里斯, 还是艾柯, 都为解释成为符号主体从不同角度开出了巨大的空间。皮尔斯认为, 由解释引出的无限符号化过程, 最终会触及那个最大的符号——“绝对客体”。<sup>⑦</sup> 莫里斯在一处把解释对符号的意义强调到极致: “某个事物是一个指号, 只是因为它被某个解释者解释为某个事物的一个指号。”<sup>⑧</sup> 艾柯也曾断言: “符号出现与否的关键就在它是否得到解释。”<sup>⑨</sup> 但他们都没有将此观点全面阐述, 并贯彻到自己的全部符号学体系中去。

就笔者目力所及, 当今世界真正承续皮尔斯、艾柯传统, 因应反讽时代的符号特征及要求, 将解释作为符号主体, 建构起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体系的, 是赵毅衡的新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下称赵著)。<sup>⑩</sup> 为了查明解释是如何成为符号主体的, 有必要对赵著做一粗略分析。

如果说, 皮尔斯、莫里斯、艾柯还是在与“符号”、“对象”的关系中谈论“解释”的话, 那么赵著则是在“解释”中谈论其与“符号”、“对象”的关系。正是这种“翻转”或者“颠倒”, 使赵著最终确立了解释这个符号主体。

人类因追寻意义而存在, 因表达意义而符号, 并因此成为符号的动物。处理人类、意义、符号的关系, 应是所有符号学的工作。赵著在此一问题上, 首先承认意义决定符号。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是符号必定携带意义。没有无意义的符号, 也没有无符号的意义。哪怕是“空符号”, 也迫于语境压力而逼出意义。因此, 意义从哪里来, 谁决定意义, 才是决定符号主体的关键。赵著认为, 是解释决定意义。为了确立解释的符号主体地位, 赵著遵循了五条符号学原则。第一, 意义决定人的存在和符号的存在; 第二, 解释决定意义; 进而引出第三条: 解释决定符号和文本。是否符号、文本, 是怎样的符号、文

①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78-83页。

②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17页。

③ 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文一名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④ 参见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78页。

⑤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2-283页。

⑥ 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137、183页。

⑦ 参见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79页。

⑧ 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80页。

⑨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103页。

⑩ 下面评述此著的相关引文均出本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不再单独注明。

本,解释说了算。解释为符号和文本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由于符号必有意义。为捍卫解释提供意义的唯一性,或者说坚守解释必定能提供意义的绝对性,赵著又引出第四、第五条原则,即“任何解释都是解释”、“断无不可解之理”。第四原则,确立了任何解释的正当性,为符号、文本表意,释放出无限空间。第五原则,从解释角度,论成任一符号和文本必是意义之物。

这五条原则,彻底颠覆了以往将“发送者”作为符号主体的历史。发送者成为符号主体的论述逻辑是:“发送者→符号(文本)→接收者(解释)”这个符号化过程,是层层决定的关系:发送者决定符号(文本)的意义,符号(文本)决定接受者如何解释意义。接收者解释的合法性,来源于发送者。发送者君临一切、主宰一切。接收者则处于被动之被动的地位,毫无主体性可言。“言不尽意”体现了发送主体的“特权”。所谓“言不尽意”,不仅指符号、文本之“言”,也指接收者解释之“言”。所有这些“言”都无法穷尽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意图意义控制、判断文本意义和接收意义,高居于符号化过程的其他环节。

发送者高于一切的符号化过程,对于确立发送者的主体地位看似无疑,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发送主体往往落空,是个“虚幻主体”。一方面,符号、文本的发送者,一部分根本不是人,谈不上主体,如自然符号。但悖论是,没有人的介入,没有意义的赋予,任何自然物事,又不可能自动成为符号。“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因为解释的介入,而具有符号意义。另一方面,符号、文本的发送者可能缺失,或者无法确定。除自然符号外,再比如大局面历史文本: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阶段,如何找到其发送者?再一方面,即便曾经有一个作为主体的发送者,由于符号传送的时空距离、表意距离,也很难追溯,比如甲骨文、三星堆文字的符号发送者是谁,很难确定。最紧要的方面,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

依然要靠另一符号、文本来获取,而其中的“真/伪”将卷入更为复杂的问题。进入反讽时代,意义更是移出符号、移出文本,有意制造意义“烟幕弹”。总之,如此众多的因素,使发送者这一符号主体成为最靠不住的虚幻主体。“言不尽意”也因此符号学论域中成为一个伪命题,由于发送主体的不可靠,我们无法确定“意”所包含的真实内容,就根本谈不上“言”不尽意的问题。

解释作为符号主体,才真正有效地将“主体”锚定在人身上,也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把这个“主体”贯穿到一切符号表意过程始终。解释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是人类通过符号、文本达到理解、进行对话的行为。而在狄尔泰看来,“理解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的主观体验性,它也属于读者,而非仅仅属于作者”,职此之故,“一个文本,甚至于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其作者所生活时代及环境的文本,都是能够阅读和被理解的;而且任何人都不需要完全以作者式的阅读来理解文本”。<sup>①</sup>钱锺书先生对此也颇有会心,所谓“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误解或具有创见而引人入胜”,<sup>②</sup>以及“作者之用心未必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sup>③</sup>等等都力图表达解释在符号化、文本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以为,只有解释作为符号主体,这些现象也才解释得通。因为,诚如伽达默尔所言,从根本上说,我们永远是从我们自己的意义视域出发来看待文本的,解释理解实际上是个自我理解的行为:理解我们自身历史的真实以及它和过去连绵不断的联系。<sup>④</sup>如果“人文学科的目标是理解,而自然学科的目标是说明”这个命题真而不伪的话,<sup>⑤</sup>那么,也只有解释作为符号主体的那种符号学,才能兼具自身的双重职责:“既是诸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又是诸科学的工具。”<sup>⑥</sup>说到底,“人类历史就是一系列的解释”。<sup>⑦</sup>

解释符号主体的确立,使赵著将发送主体的符号化过程:“发送者→符号(文本)→接收者

①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4页。

②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20、1073页。

③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10页。

④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页。

⑤ 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董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

⑥ 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78页。

⑦ 福柯语,转引自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77页。

(解释)”颠倒和重建为:“发送者←符号(文本)←接收者(解释)→……”。这一颠倒和重建,使赵著所建构的主体符号学,具有了朝向过去、此刻和未来全面开放的品格:符号向意义开放,意义向解释开放,解释向接收者开放,接收者向人开放。这种全面开放的符号学,真正具备了应对、考察和分析当今这个反讽时代符号和文本的能力。因为当意义移出符号、文本之后,唯一可靠的主体是解释主体。

### 三、解释怎样进入主体的符号学

主体符号学建构的另一维度,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如前所述,主体的符号学,即是对人这个主体进行符号学研究。在这方面,巴黎符号学派的“激情符号学”被视为先驱。但以作者的视野范围来看,除科凯的部分论述,其他符号学家的研究还是一种“非主体的主体符号学”,当今世界对主体的符号学有所建树、有明显推进的是诺伯特·威利的《符号自我》<sup>①</sup>以及前面提到的赵著。

《符号自我》从“自我”切入“主体”,建立“主体的符号学”。它以皮尔斯的“符号即自我”为逻辑起点,着重解决自我的内部构成、对话方式及其与他者的关系。它整合皮尔斯和米德的思想,提出自我由“客我-主我-你(me-I-you)”三维构成。主我、客我、你分别代表现在、过去和未来时段的我,符号自我即是这三者间的不断对话、相互运动。“主我”与“客我”间的对话表现出间接性、自反性特征。“主我”与“你”的对话则是直接的和线性的。这种对话虽然在符号自我内部进行,但不是封闭的、自循环的,而是经由“客我”通达广义他者:外部环境、文化规约、意识形态等,亦即文化全域,实现符号自我与符号社会的“符号互动”。广义他者积淀为客我的主观经验,以符号形式参与当下主我的生成,部分体现为“身份”。身份作为自我的符号集合,一方面确证了自我的社会性与互动性;另一方面又制约自我对文化符号的接受方式和传达渠道。当代社会身份的繁杂和冗余,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本体失落的危

机。这种危机还来自自我面对经验世界时,迫于超我理想或本我欲望的压力,所作出的上、下还原:或者还原为某种文化共同体,或者还原为某种本能机器。无论哪种还原,本体自我都存在被“吞噬”的风险。对此,符号自我内部具备调节机制:从其对话性、自反性中获取反还原的张力、倾向和平衡。威利的《符号自我》,虽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意欲通过对符号自我的分析,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为美国立宪寻求新的平等、自由根据,并自信“为民主提供了人性的基础”,<sup>②</sup>但其对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具有明显的推进。

应该说,赵著是接着威利的话往前说的。在赵著看来,入思的“自我”,只能是过往的和未展开的自我,此刻的“自我”正在“思”,无法把握,只有经由“思”对过去和将来的自我进行把握,才能得到符号自我。赵著也同样认为,符号自我是由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身份”构成。自我落入世界,落入情景,就因时因地展开并呈现为若干“身份”。说人活在自我中,实际上是说人活在“身份”中。“身份”是人和“自我”的在世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合集就是“自我”或“主体”的元语言。显然,这正是威利主体符号学的进路。赵著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每一个“身份”都是“自我”的一个“符号”、一个“文本”。既然是“符号”、是“文本”,其符号主体就依然是“解释”。也就是说,这些作为自我的符号、自我的文本,同样符合赵著的最高原则,解释使之成其所是:这些符号和文本在解释中获得意义、获得本质,而这个本质就是“自我”的本质,也是“主体”的本质。这样,赵著关于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就又回到对符号的主体研究上。主体的符号分析到此成为真正的符号学问题。主体符号学的两个维度在此处达成媾合和体系化。

除了查明一般主体、发送主体的构成外,建立解释这个符号主体的赵著,对威利《符号自我》的另一突破,是从“解释主体”的角度,切入主体的符号学,并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赵毅衡将“言不尽意”翻转为“意不尽

<sup>①</sup> 下面评述此著的相关引文均出本书(文一茗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不再单独注明。

<sup>②</sup> 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第19页。

言”。这个“言”不仅是符号、文本之“言”，也是解释之“言”。所有这些“言”绝不是发送符号主体的“意图”意义所能涵盖，理论上讲，无法穷尽。这样，在“经验/表述”的关系上，在回答人的经验在表述上如何可能，以及经验怎样得到表述和如何表述等一系列主体符号学的问题上，赵著走着另一条思想路线：既不是经验决定表述，也不是表述反映或决定经验，而是解释决定表述和经验。这就触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解释的符号主体”究竟是一个什么主体，如此神通广大？换个问法：谁决定符号、文本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如何可能？解释主体是如何获取自身而“站立起来”的？

诚然，在赵毅衡那里，面对符号、文本，任何解释都是解释，似乎解释拥有无边的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自由是有前提的。因为任何符号解释活动，都是解码活动。意义植入“感知”，成为符号，能够被接受、被解释，是有规则的。任一解释和意义重建，都会受到这一规则的“控制”。这个规则就是符码。而符码的集合，就是元语言。解释主体的解释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元语言的“限制”，解释的可能性、合法性来源于元语言。“控制”、“限制”、“合法性诉求”等即是“规训”，解释主体正是在元语言这种不断的“规训”中成长，并成其为自身。这样，元语言成为解释主体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在赵毅衡那里，作为文化的元语言，又是被元元语言所决定的。这个元元语言，就是“意识形

态”，“它的主要任务是文化意义活动的评价体系。每个社会性评价活动，也就是意识形态支持的一个解释努力。”不难看出，赵著从解释主体这条路，同样实现了符号自我与符号社会的“符号互动”，并不期然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相遇：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对文化的决定和建构作用，虽然有别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与广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精神相通。这样，引入“解释主体”的赵著，就从另一个方向，将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这已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论。

### 结 语

建立解释主体，在笔者看来，不仅是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建构的有益尝试，其突出的意义更在于，它引导着符号学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型：从单纯的方法论，转向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固执地认为，这个“主体”多元含混：兼具“非同一性”、“行为主义”、“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既延续了皮尔斯、艾柯一脉的传统，又汲取了当今人文学术最具活力的诸种思想。它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应对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反讽时代，能够有效处理当代文化运演中的某些复杂问题。但与之相伴的疑虑则是：如此发展下去的符号学，在有背其某些初衷的前提下，如何才能在开出的新路上，“人文的”、“有效的”继续前行，而不会给符号学本身一个反讽？

## Toward an Interpretative Subject: Constructing Subjective Semiotics in the Age of Irony

Tang Xiaolin

(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 Sichuan 610064 )

**Abstracts:** To establish a subjective semiotics is the important step to lay the groundwork of semiotics as a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 subjective semiotics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a subjective study of semiotics and a semiotic study of the subject. In the age of irony, meaning edges out of the text, and both the subject of addresser and the text are not reliable. To establish an interpretative subject is not only the demand of semiotics, it also develops semiotics from a simple methodology to an effective ideology.

**Keywords:** interpretative subject, the age of irony, subjective semiotics

(责任编辑: 龙 石)